

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

——兼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金晓晨 ○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伦理

——兼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金晓晨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兼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 金晓晨著.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9. 11

ISBN 978-7-5663-2119-0

I. ①中… II. ①金… III. 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伦理学-研究-中国②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F123.9②F279.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04808 号

© 2019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 ——兼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金晓晨 著

责任编辑：汪友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100029

邮购电话：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010-64492342

网址：<http://www.uibep.com> E-mail：uibep@126.com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成品尺寸：170mm×240mm 13 印张 226 千字

201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63-2119-0

定价：42.00 元

目 录

绪论 // 1

- 一、问题的缘起 // 1
- 二、研究意义和目标 // 2
- 三、研究现状 // 3
- 四、研究方法 // 5
- 五、主要内容及研究结论 // 6

第一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伦理研究 // 15

第一章 人性的善恶 // 17

- 一、经济基础与人性善恶 // 17
- 二、宗教与人性善恶 // 18
- 三、本章小结 // 19

第二章 西方市场经济伦理的演变路径 // 21

- 一、前古典经济学 // 22

二、前古典经济学向古典经济学的转型 // 27

三、古典经济学 // 32

四、新古典经济学 // 43

五、宏观经济学 // 48

六、现代经济学 // 50

七、本章小结 // 55

第三章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 // 57

一、理性主义的诞生 // 58

二、理性主义的发展 // 63

三、中国传统经济伦理 // 67

四、本章小结 // 101

第四章 与市场经济相伴的现代科技未在中国诞生的原因 // 103

一、历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 // 103

二、中国历史上现代科技没有诞生的原因 // 110

三、本章小结 // 114

第五章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及发展模式 // 115

一、从经济角度解读历史 // 115

二、先秦经济思想 // 118

三、秦汉经济思想 // 123

四、历史上三次加重国营经济比重改革的启示 // 128

五、中国对外贸易史 // 132

六、本章小结 // 134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及在中国的实践 // 135

一、马克思的人性观 // 135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 136

三、马克思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 140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 142

五、本章小结 // 152

第二编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 // 155

第七章 混合所有制是我国现阶段国企改革的可行选择 // 157

-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弊端的揭示 // 158
- 二、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改良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借鉴 // 159
- 三、中国传统经济模式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 // 163
- 四、本章小结 // 164

第八章 改革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经济实体 // 165

- 一、政府由管企业变成管资本 // 166
- 二、顺应董事会中心主义潮流并保障其中立地位 // 168
- 三、国有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承担信义义务 // 171
- 四、激励与制衡以解决内部人控制 // 178
- 五、规制企业的竞争与创新 // 187
- 六、本章小结 // 191

参考文献 // 194

后记 // 198

绪 论

一、问题的缘起

因长期从事国际经济法的研究，自然需了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简称 TPP) 等区域贸易协定，而 TPP 协定被普遍视为旨在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其中限制国有企业的条款对我国国有企业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而我国恰在此时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这引起了作者的极大兴趣，故此，开始了对国有企业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研究。

然而在研究中，作者产生了很大的困惑，我国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何种理论，改革的措施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否相适应。若将此问题分析透彻，则须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梳理。

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积累的深层次矛盾越来越多，如何从源头上化解积弊，是我们新时期面临的任务。因而在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中，中央首次提出了需要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的理念，也就是说，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自下而上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自上而下的系统谋划。目前对市场经济体制引发的争论，很大的原因是缺少对其体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规范。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何谓我国市场经济的伦理，它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契合或冲突的程度如何，需要如何依此进行规范，相应地，相关法律法规如何进行调整，这都是需要我们研究的。

二、研究意义和目标

既然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那么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就是我们绕不开的任务。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建设也面临着挑战。在国内，我国的市场经济如何进一步完善，以适应我国经济进入创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在国际上，由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持续不断，而焦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在某种程度上被其他国家认可，这也是我们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因此，厘清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伦理，有助于认识并把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对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市场经济伦理有三个来源：一是西方市场经济伦理，二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三者结合，形成了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伦理。笔者试图将此三种经济伦理进行梳理，厘清其对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伦理的影响，肯定其蕴含的积极因素，正视其短处，以为我国下一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提供参考。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应与中国市场经济伦理相适应。我国目前市场经济最主要的特征是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即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因此下一阶段改革需为其创造真正公平的竞争环境；二是解决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应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

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目的是确保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情形下作为独立的市场经济参与者的地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现代公司制度最重要的特征，也应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而混合所有制改革则有助于所有

权与经营权的真正分离。为此，政府要意识到国有企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应使其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这是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前提。

三、研究现状

（一）市场经济伦理的研究现状

对我国市场经济伦理有影响的伦理观主要有三种：一是西方市场经济的伦理观。市场经济发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其伦理观中合理的部分可为我国所借鉴。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观，其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三是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必然对我国市场经济的伦理观具有指导意义。

西方市场经济的伦理观是伴随着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而逐渐成熟的，故西方学者在梳理经济思想史时，必会总结其伦理观的发展。哈佛大学教授哈里·兰德雷斯（Harry Landreth）、普林斯顿大学特聘教授大卫·C. 柯南道尔（David C. Colander）合著的《经济思想史》（2002）即是如此。可以说，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者虽然努力将其经济理论推崇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也意识到了其伦理上的缺陷，即工人阶级的绝对或相对贫困、失业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无法根除的，因而不断为其伦理上的缺陷加以辩护。当其理论遭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后，美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即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道德缺陷进行了辩护，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虽有先天的道德缺陷，但凡抱有良好初衷以根除其缺陷的行为，其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观主张用道德考察一切，包括经济事务，但在其律条背后，充满着经济因素的影响。传统的礼制、尊卑思想的存在是由物质财富不充裕所致，其抑制商业、反对逐利的根源是因古人不了解追逐私利可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物质财富。随着经济的发展，改变旧有的道德视角，对中国历史进行经济分析的学者开始出现。钱穆先生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显示了中国的历史学者对经济的重视，其在《中国经济史》中对中国经济史进行了梳理。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开了将经济学理论引入中国历史研究的先河。甚至一些非专业历史学者，如波音，在其《王朝的家底：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2016）中也从经济学的视角解读中国历史。唐凯麟、陈科华合著的《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2004）从经济、政治与伦理三乾同宗共源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强调德性是古代经济伦理的

最高形态。

与唐凯麟、陈科华一样，研究中国市场经济伦理的学者无一不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万俊人在其《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2000）中讨论了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而王小锡自2000年起提出了“道德资本”概念，反复强调道德的作用，于2013年在《“道德资本”何以可能——对有关质疑的回应》中解释其“道德资本”的概念时指出，资本要讲道德。周荣华在其《道德经济学引论》（2011）中更提出了道德经济学的概念。

张志丹在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经济伦理意蕴》（2018）中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应为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核心思想，并明确提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企业、个人都应负起道德责任。学者们都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道德的思想相一致。但是，学者们尚未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研究中，但若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提前让企业、个人遵从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标准，将欲速则不达，他们未意识到，道德标准及其适用范围皆应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韩毓海在《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2017）一书中，探讨了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否应采取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对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所采取策略的原因作了独到的分析。

但将上述三者结合起来以研究中国市场经济伦理观的成果尚不多见，因此，笔者希望将三者的研究结合，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因并梳理其背后的伦理，为进一步改革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尽绵薄之力。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的现状

有关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既包括经济学视角的研究，也包括法学视角的研究，但目前学术界多集中于其意义与改制前面临的问题，而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及改制后公司的治理所涉不多。

经济学视角的研究主要包括：季晓南在《既要重视企业管理，也要重视公司治理》（2014）中系统地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将遇到并须着力破解的六个问题；刘纪鹏在《中国国资改革创新模式探索》（2014）中认为虽国企改革环境已变，但混合所有制改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依然存在；黄淑和在《国有企业改革在深化》（2014）中指出此轮混合所有制改革突出的难点是配套改革迟

缓；舒文琼在《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过“四道槛”》（2014）中认为如何借助混合所有制为企业经营注入活力，如何既调动合作伙伴的积极性又使得经营权尽在掌控中，如何避免引入民营资本造成新的“垄断”以及从国家层面建立必要的保障机制，这些都需引起足够的重视；叶檀在《民资参与混合所有制需解决的难题》（2014）中提出混合所有制的难点在于如何保持国有和私有投资者的资产安全与权利平等。

法学视角的研究主要包括：刘俊海在《全民股东权利与国企治理现代化》（2015）中，就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提出了建立企业信息披露制度赋予全民股东知情权、落实股权平等原则以推动混合所有制发展、完善诚信问责机制、建立国企高管良性激励机制的建议；吴越在《国企“混改”中的问题与法治追问》（2015）中提出并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的相关问题；蒋大兴在《合宪视角下混合所有制的法律途径》（2015）中认为应从宪法角度理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法律途径，以寻求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妥当方式；冯果、杨梦在《国企二次改革与双层股权结构的运用》（2014）中，提出了在国有资本不具有控股地位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其双层股权结构模式能在国有资本淡出的同时，保有国家对特殊领域内的企业实施必要的控制。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感兴趣的领域是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以应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协定的挑战。顾敏康、孟琪在《TPP 国企条款对我国国企的影响及对策》（2014）中，认为应对以美国为主导的 TPP 中有意无意地针对中国国企改革条款，中国只有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才能化解 TPP 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综上，虽然有些国内学者对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企应该如何治理，从各自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多属于规范性研究，未进一步进行实证性研究，且系统性似显不足。

四、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一）经济分析的方法

本书在研究中外历史上法律、经济伦理时，采用了经济分析的方法，认为道德伦理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物质财富的丰裕程度及分配方式，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二）历史研究的方法

本书对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国历代的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及其实践进行了梳理，试图了解其如何影响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

（三）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

本书涉及哲学、经济、历史、法学学科的内容，因此，本书借鉴了哲学、经济、历史、法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市场经济伦理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研究。

五、主要内容及研究结论

本书的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伦理的三个理论源头，即西方市场经济伦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和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试图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伦理的成因。第二部分讨论的是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且认为，国企改革应该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伦理，进行顶层设计。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研究

1. 西方市场经济伦理

西方市场经济伦理最基本的问题是，是否认可市场的参与者依据自己的利益行事，这就涉及社会道德对私利的态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道德准则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都密切相关。通过考察历史，发现无论宗教教义或者世俗道德都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而改变。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财富匮乏，遂要求将财富尽可能平均分配。东西方社会都是如此，尤其在西方的宗教教义中即要求民众节俭，爱世人，但对富人的态度并不友善，如《圣经》中有富人进入天堂如“骆驼穿过针眼一般难”的咒语。因而限制个人占有财富就是前资本主义道德的必然要求，故对追逐私利不予支持 and 认可。

任何社会，只要有分工，商业就不可避免。但因古人认为世间财富是定数，且多认为财富来源于土地，商业并不创造财富，只是做到互通有无而已。故古人认为，只有那些为满足自己需要的交换才是正当的，货币的主要功能是交换的媒介，而不是财富的象征。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的理性发展由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与上帝，变成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中国，“隐匿了上帝”，个人的命运由自己的德行来决定。在西方，上帝仍然存在，但也认为，是否能够获得上帝的救赎，取决于个人的言行是否符合教义的规定，换言之，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个人的选择，而不单单是上帝的决定。

但是，由于当时的物质财富并不丰裕，个人的欲望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又因宗教教义或道德准则的要求，人们需要依靠理性抑制自己的欲望，但往往是不成功的，可以说处于意志无力的状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意识到社会的财富并不是定数，可以通过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且发现，人的私欲正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可以极大地提高财富的创造速度。这时人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将财富的增加作为首要目标，而将公平分配置于次要地位，西方世界选择了该道路；二是宁可牺牲财富增加的速度，而保持公平分配，中国选择了该道路。

西方世界肯定了人的私欲，认为这是市场经济伦理的基石。美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学者提出了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即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是以私利作为行动依据的。而且，他们进一步主张，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私利可达公益。因而在制度设计上，西方世界制定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规范；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主张自由主义，反对政府的干预。

亚当·斯密及其他古典经济学者同时认识到了市场经济在道德上的缺陷，竞争的结果会导致分配不公。但是另一些古典经济学者试图为其辩护，认为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使在道德上有缺陷，也是客观规律所致，与制度无关。因此，他们借助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提出了工资基金学说，论证了工人阶级仅能获得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低工资是合理的。但李嘉图等学者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格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所决定。可他们不能解释，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决定，为何不将利润分配给商品价值的创造者，即广大的劳动者，却将其全部留给资本的拥有者？

新古典经济学者为了弥补劳动价值论的道德瑕疵，认为商品的价值，或其表现形式即价格，并不由劳动决定，而是由其边际效用决定。他们试图用抽象的边际效用取代劳动作为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从而避免陷入劳动价值论的道德陷阱。但是，他们最终认识到，完全用抽象的边际效用来决定商品的价格是行不通的，马歇尔修正了商品价格仅由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的观点，认为边际效用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犹如剪子的上下两片，均须发挥作用，缺一不可。

此后，又有经济学者提出，实际上生产过程的所有参与因素，都参与了利润的分配，而不仅仅是资本提供者；而且认为，所有的参与者获得报酬的多寡，取决于其投入的多少，并举例说明劳动者的报酬也取决于他的投入，若一个劳动者能够抑制他们当前的消费，将资金投入教育，提升自己的技能，就可获得更高的回报。但无论如何辩解，都不能否认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分配不公的事实。

此外，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本身是自洽的，可以带来充分的就业与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事实并不如此。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指出资本家占有了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且资本主义经济体并不是自洽的，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美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应对方法。他认为政府对于经济体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通过增加公共开支甚至直接投资等方法弥补投资不足，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政府也可在经济危机爆发、信贷收缩之际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方式减缓危机的影响。凯恩斯的思想开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先河，也确实一定程度上促使社会缓解了危机，扩大了就业，但其理论无法从根本上避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缺陷。

现代经济学理论基本上以博弈论为依据建立数学模型来探讨经济问题。人们发现，参与博弈的双方若仍以私利为依据决定己方的对策，并不能达到双赢的结果，而在多次博弈或在有信息沟通的博弈中采取合作的态度，会达到双赢的结果。这也将理性主义发展到规定理性的阶段，即在合作博弈中采取利他的决策，会使自己的利益及总体利益最大化。

在公司制度上，现代经济学理论有意或无意，采取了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经营模式。资本所有者变为红利的领取者，与企业的经营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不但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也会减轻社会分配不公的程度。毕竟，在西方证券市场，投资的主力之一是各类养老基金，这些基金获取的红利会用于国民的养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公司的利润间接惠及广大民众。

西方的经济伦理可以总结如下：承认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包括各类公司是有自己利益的独立经营实体，可以依据各自的判断作出自己的选择。在资源的配置上，基本由市场来决定，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是市场也有失灵的现象，需要政府的干预。政府的作用在于通过税收等方式进行二次分配，以照顾弱势阶层，为市场的参与者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必要时通过货币政策及

财政政策对市场进行调控。

2.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

中国的先哲很早就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主张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人们无法得到足够的财富满足自己的欲望，先哲即选择以道德抑制私欲，希望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为此，通过礼制规定社会地位不同者享有的物质待遇有别，严禁超出规定，侵占他人的份额，使他人特别是百姓失去基本的生产及生活资料，因而提出了不与民争利的主张。

先秦儒家认为统治者不应为了自己的享受而敛财，也不应为了扩充领土进行战争，认为应实行王道，不战而屈人之兵，故此主张轻徭薄赋，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但政府官员尤其是主管财税的官员自然会认识到财政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因而重视经济发展，甚至主张国家直接参与经营，以达到为国敛财的目的。这两种观念在《盐铁论》中有所展示。儒家学者认为应该以农为本，抑制商业的发展。原因有二：一是认为财富来自土地及农夫的劳动，工商业并不创造价值，从事工商业的人多了，并不能提高财富总量，还会耽误农业生产。二是认为经商的人追逐私利，不利于社会道德的普遍提高。但官员认为，工商业的发展能够创造财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若以今天的观念视之，官员的主张是正确的。至于如何发展工商业，儒家学者认为，若经营工商业不可避免，则应由民间经营，国家不应与民争利。而官员认为，国家财源匮乏，财政收入微乎其微，若国家不直接从事工商业，只能采取加税负的方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若要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国家只能直接从事工商业赚取财富。但现实情况是，具体参与国营事业的官吏，会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将国营事业的利益最大化，这就会产生极大的弊端，会阻遏经济的发展。

以今之观点评断，儒家学者的主张似乎更加正确。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大一统的国家，在通信、交通较为落后的时代，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确实需要财力支撑，更何况在面对战争之时，毕竟儒家的王道，对中国周围的游牧民族没有任何说服力。于是，双方的观点不断碰撞，终于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体制，即在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实行国家专营或国营事业占据较大比重的政策，对一般行业、农业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国家不加干预。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有过几次改革，都曾试图增加国营经济的比重，但皆以失败而告终。汉武帝时期，桑弧羊实行盐铁专卖，并对工商业课以重税，给汉朝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最终以取消铁业专卖、减轻商业税负而终结。西

汉末年，王莽的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国营经济的比重，并将改革的措施伸向了农业，强制官绅阶层将超过规定限额的土地赠与他人，最终，这些改革措施随其统治被推翻而终止。

宋代王安石的改革也是如此，试图加重国营经济的份额。尤其是他采取的青苗法，第一次将国营事业伸向了金融领域。但是，这些改革者不了解公共选择理论，忽视了吏治败坏的影响，导致改革失败。

中国理性主义在先秦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虽然主张用道德抑制人的私欲，但其道德标准及实施范围都有限。无论孔子还是孟子对经商都并不排斥，孟子甚至认为，应该鼓励人们拥有私有财产，强调社会分工的积极作用，由市场决定商品的价格。而且道德的适用范围主要集中在统治阶层，或以君子自居的知识分子，对一般百姓持宽容态度。

令人遗憾的是，自汉代董仲舒始，儒家的道德标准不断提高且其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宋明理学将道德标准推向极致，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使中国的理性主义止步于用理性抑制欲望的阶段，没有进展到私利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甚至可达成公益的阶段，使可以促进经济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能萌生于中国大地。

另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人们的知识有三个来源，即生活实践、生产实践、科学实验。科学的诞生需要文人与具有实践经验的工匠相结合。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蔑视劳动阶级，致使中国的文人沉溺于儒家经典及文学创作，不愿与工匠结合，致使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因。

3. 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

马克思主义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一是从道德上对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进行了批判；二是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会导致其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描述较为简约，只是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极高，可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政策；而在社会主义时期，仍需按劳分配。也就是说，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因人的需要都可得到满足，所以，人不可能将私欲的满足作为行事标准，能做到大公无私；而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财富没有丰裕到按需分配的程度，人仍有私欲需要满足，故道德标准不可能苛求人们做到大公无私。

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否采取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即生产资料的全面公有制，生产按计划进行，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若采用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

人的道德水平在不能实行按需分配的情况下，能否与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也需要作出回答。通过苏联的实践，证明若社会主义社会采取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则人们的觉悟无法与之相适应，计划经济无法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确定采取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即生产资料的全面公有制，生产按计划进行。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官员与人民的道德觉悟问题，遂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是通过教育提高全国人民的觉悟；二是对官员采取全民监督的方式，以监督官员的行为。

邓小平同志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中国的“具体实际”就是，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这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要求的物质极大丰富，从而可以满足人们的全部需求不同。因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才是硬道理，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不能动摇。同时，邓小平同志也意识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道德标准适用于少数的先进分子，对广大人民群众提出同样要求是不合适的。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至今最有效率的经济模式，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必然的选择。对一般民众而言，对于其私人利益的追求也是可以认可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是我们必然的选择。虽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保留一定规模的国有经济及政府对市场的必要干预是必然的，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其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通过对西方经济伦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的梳理，我们可以探寻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伦理：对各种经济成分都应予以保护，为各类经济成分创造公平的经营环境，认可各类所有制企业作为经营的独立实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其利益的最大化。此外，资源主要由市场配置，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企业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的干预。

（二）国有企业以公有制为主体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

1. 以公有制为主体混合所有制是我国现阶段国企改革的必然选择

中国市场经济模式受西方经济模式、中国传统经济模式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的影响，采取的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共同发展。因而国有企业是有其存在的必然的。

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有其道德上的先天缺陷，尽管历代的西方经济学家纷纷提出各种理论为其辩护，但说服力有限，不足以服人。该模式下的分配不均、